



纪念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诞辰 70 周年

法国籍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1941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华沙,1996 年 3 月 13 日病逝于华沙,其主要作品包括《十诫》(1988)、《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1991)、《蓝》(1993)、《白》(1994)、《红》(1994)等。

作为一位偏爱思想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电影艺术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坚持在电影作品中讨论宏大问题:自由、平等、爱、正

义、死亡等。他擅长把这些大问题和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个体生活细节相结合,能以超常的编剧能力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情景中编织出惊心动魄的生活事件。他的影像始终是缓慢、细腻的,从容地叙述着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的伦理困境及其挣扎。这种对生命的耐心注视和思考使他的电影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力量。

“生命是个礼物”

文\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

1996 年 3 月 13 日,基耶斯洛夫斯基步行来到波兰华沙医院,自己办好入院手续,接受一个心脏搭桥手术,但是,他却再也没有醒来。基氏拒绝了朋友们让他去国外做手术的建议,也拒绝了巴黎、纽约和波兰另外两家专业心脏手术机构的邀请,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人,他相信自己的医生。

那天,当基耶斯洛夫斯基走向医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走向死神。

同样,在电影《机遇之歌》中,主人公威特可坐上了飞机。在那之前,首先,这个出国的机会原先并不是他的;其次,他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再次,他为了心爱的妻子的生日,推迟了起飞的时间。于是,在银幕上,我们看到,飞机在空中炸开。在《机遇之歌》的三段故事中,这是最平和的一个故事。威特可与我们无数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但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却给了他一个最猝不及防的结局。

“第三种结局对我触动最大——飞机爆炸的这个结局——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管是发生在飞机上还是在床上,都一样,没什么区别。”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他是个绝望的人。他即使让他的主人公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也还是要他的一切在爆炸声中碎裂。然后,影片戛然而止,字幕一行行出来,他连陪着电影里的人伤心的时间都不给你。

但,那又何尝不是生活的真相。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完《机遇之歌》后说:“我们每一天都面临一些足以结束我们一生的选择,而我们却对此全然不知——没有被充分利用。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机会。”

阴暗的人行地道里,一个丈夫来寻找他离去的妻子。那女子开着一家礼品店,丈夫在玻璃窗上敲击,引得她回头,他是寻了一家又一家店之后,才找到她,他们,曾是心心相印的人。只有寥寥的对话,他想让她回去,她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即使亲热,她的眼睛也是空洞的。

我很多时候会想,有些情意,曾经浓到化不开的,它们到哪里去了?最终,两人平静地走着,妻子告诉丈夫车站的位置,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再努力也越不过去的鸿沟了。这是基氏的一个短片,黑白的色调,不到 30 分钟,就让你知道,有些情意,如水上的浮沫,已经顺流而去了。

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吃苏打饼干,突然就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虽然这两者之间本无关联。我只吃一种苏打饼干,原先叫“达能”,现在叫“卡夫”,只吃奶盐的那一种。我有时也会吃些其他的饼干,比如奥利奥,但我永远有那种苏打饼干。我知道,我在不停地看电影,但真正喜欢的导演,只有两三个,基氏当然是其中之一。

我喜欢他电影里密密的细节,那些细节可以如藤蔓般任你展开,牵枝挂叶,想到极远极深。在《机遇之歌》中,做了医生的威特可有次去看望一个病人,在她家的院子里,阳光下,有两个男人在玩杂技中才能见到的抛球。他们把白色的小球不断地抛向空中,不断地抛和接,那些球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些美丽的弧线。威特可向身边的女人:“为什

么?”女人说:“没什么原因。好像世上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我极爱这个画面,在温暖的阳光下,他们精熟的技艺,令人眩目,但是,那是没有什么原因的玩耍。为什么要问那么多的理由呢,人生在世,就是做吧,尽力做到最好,哪有那么多的意义。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书中,基氏提到这样一件事:我碰到一个手里拿着空啤酒罐的老人。“空的吗?”我问道。他点了点头。“多少钱?”“500 兹罗提。”我仔细想了一会。毫无疑问他以为我要买个罐子。他鼓励我:“你要的话卖你 400。”我问他:“我要空啤酒罐干什么呢?”“那是你的事,如果你把它买下来,你想拿它干什么

遇,也许,也是命运。我一直喜欢一个年轻女子与一个年长男子相遇的故事,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如父亲一般,或者如情人一般,或者模模糊糊。因为他们错过了在最合适的时间遇见。

一个女人最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想,单纯,良善,肯定是其中之一吧。那些纯良的品行如素绢,令人不敢也不舍得亵渎。

法官与瓦伦丁有过如下对话:——若我被审判,时下还有像你这样的法官吗?——你不须被审判,法律不收天真无邪之人。

天真无邪的瓦伦丁发现法官对邻居家的窃听,极为气愤,但当她来到邻居家想告诉他们真相时,却看到一个温柔和善的妻子,一个也在阳台上偷听电话的小女儿,她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最终,所有的事情都会露出破绽,像法官所言,迟早,那个妻子会知道,女儿也会知道。那样一幅和美的家庭温情剧就要收场,但是,有时候,生活的戏剧自有它的序幕与高潮,也有它的收梢,局外人,不能入戏太深了。瓦伦丁是善良的,也是聪明的。

作为观众,我们有一个全景的角度,可以看到瓦伦丁与她的邻居奥古斯特,有很多次的阴差阳错擦肩而过,而那奥古斯特,仿佛是老法官的影子与替身,他把老法官的一生,重新活了一遍。这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最终,在幸存者人群里,他们两人终于站在一起。后来会怎样,不知道。

也许,当波兰的维罗尼卡死去后,巴黎的维罗尼卡就可以得到一些智慧,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延续了波兰维罗尼卡的生命?也许,年老的法官晚年四十年,就可以与瓦伦丁相遇,另谱一段人生?也可能,幸存的瓦丁与奥古斯特,会替代老法官,过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但那仅仅都是想象。我很高兴基氏的最后部电影是《红》,那是部温暖的电影。他是个绝望悲观的人,不过,他拍了电影,他相信“生命是个礼物”。

基氏在谈到艺术质量的时候曾说过:“如果我读到、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东西,我会突然间强烈而清晰地感觉到有人在表述一些我经历过、我想过的东西、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使用了比我能想像得到的更优美的句子、更好看的视觉效果以及更巧妙的声音组合,或者有那么一阵子给我美或快乐的感觉……伟大的电影制作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的话。”

当然,他的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他说:“当你创作了一些东西,你又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而结果是你碰巧触及了某个人的命运时,你会觉得很快乐。”他为那些安静地注视着电影片里浮动着的影像的人拍片,他们并不以为那仅仅是影像。

阿兰·德波顿在《爱情笔记》中说:“也许我们真的并不存在,直到有人目睹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并不能述说,直到有人能理解我们的语言。”我们不停地寻寻觅觅,可能,只是为找到共鸣。

《机遇之歌》里的威特可去看望一个老妇人,那个被医生认为只能活三年却活了十二年的老妇人对他:“有人问德兰修女,我们能为临死的人付出什么,她说,令人相信自己并不孤独。一分钟前我是孤独的,现在你来了,你来得很合时。”

每次,独自一人,拉上窗帘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我都知道,他来了,来得很合时。■

基耶斯洛夫斯基代表作



可以。”

我想,空啤酒罐自然用处有限,但是,你想拿它干什么都可以,这就是一种可能性。许多世人以为有意义的事,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分毫不值。基氏的影像,告诉人们这种疏离,不管是《十诫》,还是《三色》,还是《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都反反复复地,渲染着这种由于疏离带来的孤单。

我最喜欢的基氏的电影,是《红》。那个退休的老法官,在他乖张的行为背后,依旧是深深的孤独。他窃听邻居的电话,他对他的狗不闻不问。他与瓦伦丁的相遇,当然是机